从心理疗愈到集体抗争：《上帝帮助孩子》与《女孩，女人，其他》中的黑人女性创伤治疗范式转向

梁门秀子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DOI：10.65285/RWYSHKX.V2I7.006

摘　要：托妮·莫里森的《上帝帮助孩子》和伯娜丁·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其他》虽然相隔四年出版，却在黑人女性创伤书写上构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代际对话。本文基于黑人女性主义以及创伤理论，认为这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黑人女性创伤治愈范式：莫里森的小说是一种以代际和解以及亲密关系重建为基础的心理——个人治愈模式，而埃瓦里斯托的小说则是一种以“选择家庭”“历史联系”以及“社会运动”为基础的社会——集体治愈模式。由“一个个体如何自愈创伤”到“一群人如何共同活下去”，这不仅是叙述方式的变化，也是黑人女性主义政治由“自我修复”到“联盟政治”的转变过程。而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源于美国非裔文学与英国黑人文学所面临的种族压迫形式以及历史经验的不同。
关键词：莫里森；埃瓦里斯托；黑人女性主义；创伤书写；疗愈范式

From Psychological Healing to Collective Resistance: The Shift in Paradigms of Trauma Healing for Black Women in God Help the Child and Girl, Woman, Other

Menxiuzi L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oni Morrison’s God Help the Child and Bernardine Evaristo’s Girl, Woman, Other were published four years apart, yet they form a meaningful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in the writing of Black women’s trauma. Based on Black feminism and trauma theor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two novels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healing paradigms for Black women’s trauma. Morrison’s novel adopts a psychological-individual healing model rooted in intergener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hile Evaristo’s novel presents a social-collective healing model built on “chosen family”, historical connec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shift from “how an individual heals trauma” to “how a group survives together” marks not only a change in narrative mode, 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feminist politics from “self-repair” to “alliance politics”. The underlying logic stems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racial oppression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aced by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British Black literature.
Keywords: Toni Morrison; Bernardine Evaristo; Black feminism; trauma writing; healing paradigms

前言：

创伤书写是黑人女性文学的主题。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种族暴力的隐晦记录，到莫里森在《宠儿》中对奴隶制创伤的历史性回溯，再到当今英语世界黑人文学对于性别、阶级、性取向等多重压迫交织的表现，黑人女性作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被结构性暴力反复伤害的主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在此情况下，莫里森和埃瓦里斯托两部作品成为这个主题下两个范本。《上帝帮助孩子》是莫里森去世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她关注的是深肤色黑人女性布莱德（Bride）自我修复过程：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重新与情人在一起，重新接受这个深肤色身体，这是个人治愈过程。四年后，埃瓦里斯托凭借《女孩，女人，其他》获得布克奖，但是将十一个不同种族、年龄、社会地位、性取向的黑人女性（还有一个非二元性别者）的生活相互联系，在共同的历史和政治联盟中找到归属。两部作品主题相近，却在疗愈路径上呈现出如此鲜明的反差。

本文认为，这种不同不是简单的个人偏好，而是一种黑人女性创伤治疗模式的重要转向。莫里森所倡导的是以心理——个人为中心的治疗方式，她的思想来源于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康复理论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黑人女性主义“自我康复”的政治主张；而埃瓦里斯托提出的是以社会——群体为中心的治疗方式，在法律层面上揭示一个事实：当种族、性别、阶级等各种形式的压迫相互交织在一起时，任何一种单一的身份政治都不能够触及受害者的内心。这不仅是由于美国非裔文学和英国黑人文学的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也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自身发展的结果。

一、创伤治疗的两种范式

赫尔曼（Judith L. Herman）在其著作《创伤与恢复》（Trauma and Recovery, 1992）中提出了三阶段创伤治疗方法（Three-Phase Trauma Treatment），即把创伤康复分为“安全与稳定（Safety and Stabilization）——创伤记忆处理（Trauma Processing）——整合与再连接（Integration and Reconnection）”。这个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临床心理学的范畴，在文学以及文化领域对于创伤修复的研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个所谓的“稳定—处理—整合”的模式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认为治愈是从个人开始，在治疗师和患者之间发生，最后以一个主体再次建立亲密关系而结束。而卡鲁斯（Cathy Caruth）把创伤定义为一种“未被经验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她认为创伤会以一种侵入性的形式回归，比如闪回、噩梦、强迫性的重复行为等，这种延迟性（Belatedness）不能简单地被“治愈”，但是她也未能脱离个体心理分析的框架。

洛德（Audre Lorde）在《姐妹局外人》(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中所说的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但是人们往往误解它的含义，“照顾自己并不是自我放纵，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政治斗争 (Caring for myself is not self-indulgence, it is self-preservation, and that is an act of political warfare.)”，重点并不在于自我关怀这个动作本身，而在于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如果一个黑人女性被社会制度性地剥夺了“照顾自己”的权利，那么她坚持自我关怀就是对这种制度的反抗。虽然“交叉性”这个概念直到 1989 年才由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但是洛德在此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描述了这一点，即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不同身份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黑人女性创伤治愈的两种模式。

第一是心理——个体模式，它认可社会压迫的存在，但是把治愈的重点放在个人的自我修复、关系的恢复以及代际的理解上，在这个模式下，如果受创者经过治愈获得自我救赎，便可以重新回到生活中。

第二是社会——集体模式，即认为创伤治愈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康复，或者说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治愈创伤，无法对抗结构性的暴力，治愈需要建立非血缘关系、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参与到集体活动中去；这是一种向外寻求治愈的方式，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以及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这两种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莫里森并不是忽视社会问题，而埃瓦里斯托也不是拒绝深入内心，只是对于不同的作者来说，疗愈的重心、路径与终点设定发生了位移。

二、心理——个体范式：《上帝帮助孩子》中的代际修复

莫里森笔下的布莱德 (Bride) 是一个有着深肤色并且很成功的模特，穿着白色的衣服，开着昂贵的汽车在纽约城里自由自在的生活着，但是在这层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母亲疏远的小女孩。母亲斯威特尼斯 (Sweetness) 在小说开头就用第一人称平静地说，她生下的孩子“黑得像午夜”，这个颜色即使在黑人社区也会受到排斥，所以她远离自己的女儿。布莱德的痛苦并不是来自外部的种族歧视，而是肤色主义 (colorism) 在黑人家庭内部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这也是莫里森一贯的观点：种族压迫并不总是从外面进入，它往往首先出现在黑人母亲对女儿的目光中，在家庭关系中的细微之处。

莫里森给布莱德规划了一条治愈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身体的再接受。一次车祸后，布莱德的身体开始退化：皮肤失去光泽，上唇出现小胡子，那个被时尚界所推崇的“布莱德”的身体正在慢慢消失。这一情节承担着必要的结构功能：布莱德必须先摆脱那个被社会目光所塑造、被商品化的身体，才能再次获得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身体。

第二是对于代际关系的新认识。小说最后，布莱德回到母亲身旁，但是莫里森并没有让她们轻易地达成和解——斯威特尼斯并没有真正地悔过，她在讲述时仍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是布莱德却获得了一种重要的“看见”，她看到母亲也是肤色主义秩序的受害者，一个在种族歧视以及社区审美标准的双重压力下，把恐惧传递给女儿的母亲。这不是原谅，但是它将伤害从“母亲伤害了我”的个人故事转变为“黑人社区内部的压迫”的社会故事。但是即使如此，这个伤害的空间仍然局限于母女（代际）之间。

第三点是亲密关系的重建。布莱德和布克 (Booker) 的结合并不是浪漫主义的成功。布克带着他哥哥小时候遭受性侵犯并且被杀的记忆，在亲密关系里不断逃避，因为他从来没有解决他的痛苦。小说末尾两个创伤主体的重新相遇，并不意味着从此幸福——它只意味着他们愿意将各自未完成的悲伤摆到对方面前。

因此，《上帝帮助孩子》的治愈是非常个人化的，它不会参与到社会性的、集体的活动中去，甚至不会超过一个小家庭网络。它认为一个黑人妇女只要能够重新获得自己的身体，了解她的出身，修复一段亲密的关系，就可以治愈她所受到的创伤。这与赫尔曼的三个阶段相吻合。

三、社会——集体范式：《女孩，女人，其他》中的外向联结

埃瓦里斯托的小说是由十一个主要人物的故事组成，跨越三代人，从十九世纪末移居英国的牙买加移民后代到现代伦敦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企业家以及工人等，这些故事之间并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着血缘关系、友情关系、工作关系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而相互联系，在剧作家阿玛（Amma）的戏剧《达荷美最后的女战士》首演当晚汇聚在一起，这也是一种治愈的政治形式化：没有人可以自我治愈，只有当一个人的故事与其他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时才有意义。

不同于布莱德，《女孩，女人，其他》中的角色并没

有达到一种自我治愈的状态。阿玛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黑人权利运动，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剧作家，但是她和她的孩子亚兹 (Yazz) 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亚兹是一名大学里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在面对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阿姨 Nenet 时，暴露出自身对黑人女性经验内部差异的隔膜。而多米尼克 (Dominique) 是一个周游世界的电影制作人，在刚果的一段感情经历中被束缚，回到英国之后，她并没有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而是与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女性商人布米 (Bummi) 建立起一种深厚的非血缘联结。

埃瓦里斯托笔下的“家庭”大多是选择家庭 (chosen family)，由选择而非血缘构成。当亚兹意识到自己对卡罗尔 (Carole) 的中产阶级生活存在成见时，卡罗尔也用她的方式回应这种阶级偏见；而当拉蒂莎 (LaTisha)，一个在贫困中抚养五个孩子的黑人母亲，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雪莉 (Shirley) 的故事并置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同样的黑人女性身上，阶级差别足以造成无法沟通的感受。但是小说并没有因此变得悲观——它让这些人物最终在阿玛的首演之夜共处一室，让差异在同一个剧场空间中被承担。

阿玛的戏剧《达荷美最后的女战士》所表达的是历史联结，取材于 19 世纪被主流历史学家忽视的一个黑人女性斗争的故事。当亚兹在剧院中观看母亲的作品首次演出时，她不仅仅是在看一场演出，而且是在重新确定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位置：她的愤怒、疑惑以及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都不是凭空产生，艺术不是斗争之后的表达，而是斗争本身，也是治愈本身。

小说最后，在聚会上人们聊天、喝酒、争吵、大笑，问题依旧存在，但是关系还在继续，这就是社会——集体模式：治愈不是一个人在封闭空间独自完成的过程，而是一群人共同经历的历史过程，它没有终点，只有不断扩展的网络。

结语：

从《上帝帮助孩子》到《女孩，女人，其他》，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作者之间的风格差异，而是一种黑人女性创伤治疗模式的变化：由心理——个人治愈转变为一种社会——群体联结。这种变化是由于美国非裔文学和英国黑人文学所经历的不同历史背景造成的，同时也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从“自我恢复”到“联盟政治”的发展过程。

莫里森所面对的是美国非裔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核心创伤就是奴隶制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压迫的深度首先刻在心理层面：一个黑人女孩如何在一个把她皮肤看作缺陷的母亲身边成长？美国黑人的创伤需要先从家庭、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从一个人到自己的身体开始治愈。

而埃瓦里斯托所面对的是英国黑人经验。英国种族状况不同于美国，它是一个后殖民、移民、高度重叠的社会——黑人种族，肤色、阶级、宗教、性取向以及移民代际之间的多重差异。因此，埃瓦里斯托采用群像、采用诗歌形式、采用小写人名，实际上是对这种多样性的一种回应——她必须让众声同时发声，才能避免将复杂的黑人女性经验重新压缩为单一故事。

创伤书写总是嵌入到具体的种族政治、性别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当中。莫里森使我们看到治愈的小尺度，而埃瓦里斯托使我们看到连接的大尺度，两者结合便形成了黑人女性创伤书写的全貌。同样，比较的目的并不是要分出高低上下，而是要重新认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治愈”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诠释。

参考文献：

[1]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Crenshaw K.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 Stanford Law Review, 1991, 43(6): 1241−1299.

[3]Evaristo B. Girl, Woman, Other[M]. London: Hamish Hamilton, 2019.

[4]Herman J L.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5]Lorde A.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M]. Berkeley: Crossing Press, 1984.

[6]Morrison T. God Help the Child[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7] 伯娜丁·埃瓦里斯托 . 女孩，女人，其他 [M]. 王莫言，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

[8] 托妮·莫里森 . 上帝帮助孩子 [M]. 潘岳，雷格，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

作者简介：梁门秀子 (1996 年 2 月 −)、女、汉族、吉林省德惠市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学，跨文化交际。